中国新闻名专栏 | 社评

□本报评论员 王娇萍

维护工会主席权益应是社会共同责任

这些天，基层工会主席的权益维护问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深圳龙钻纸品厂员工胡海龙和杨敏江，经民主选举为该厂兼职工会主席和兼职工会委员，任期3年，而龙钻纸品厂却只与他们签订为期半年的劳动合同，并以合同到期为由非法解除与他们的劳动关系。12月2日，深圳市总工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依法对此进行公开谴责，认定其为违反工会法、侵害工会利益的典型事件。

而浙江建工西安分公司工会主席蒋小阳，则因帮农民工讨薪遭袭，身体多处受伤。事后，陕西省市县三级工会高度关注，及时看望慰问，并要求相关部门督促市县劳动部门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妥善处理，但悲剧毕竟已然发生。

本报接连报道的这两起侵害基层工会主席权益的事件，并非完全巧合。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维权任务日益艰巨，工会干部的履职风险也进一步凸现。特别是在基层企业，工会干部要代表职工，然而其自身又是企业雇员，这种经济依附关系便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工会干部切实履职，直接影响到基层工会维权。

这一点已被人们认识到。今年10月30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工会法执法检查报告坦言，工会干部维护职工权益时容易遭到打击报复，“有的企业避开或者违反工会法中有关保护工会干部的规定，找借口解雇敢于维权的工会干部，或者虽然不解雇，但用其他手段使工会干部无法再在本企业继续工作”。

显然，要使工会干部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必须对工会干部自身权益给予有效保障。对此，有关各方早有共识，并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比如，修改后的《工会法》进一步加大了对工会干部的保护力度，第18条规定：“基层工会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延长期限相当于其任职期间；非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尚未履行的劳动合同期限短于任期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至任期期满。”第51条更是明确了打击报复及侮辱、伤害工会干部行为的法律责任。

同时，意在加大对工会干部合法权益保护的有关制度设计也进一步完善。近年来，全国总工会实行了一系列措施保护企业工会主席权益：先是设立了工会干部权益保障金，又于2007年8月制定下发了《企业工会主席合法权益保护暂行办法》，而2008年8月颁布的《企业工会主席产生办法》进一步对企业工会主席的管理、待遇等作出规定。

应该说，在法律法规等制度设计层面，对工会干部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正在不断强化，但工会干部权益受侵害事件依然时有发生，其主要原因是法律法规难以落到实处。就拿胡海龙、杨敏江来说，他们作为工会干部所享有的劳动就业权利，《工会法》有规定，《深圳市实施〈工会法〉办法》更是进一步细化明确，然而龙钻纸品厂仍以“劳动合同到期”为由解雇他们，且拒不改正。

龙钻纸品厂何以能够如此嚣张？往深里探究，与工会组织维权时“势单力薄”的处境不无关系。以《工会法》为例，它是工会履行维权职责最根本的依据和依靠，但是《工会法》的执法主体并不是工会，而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人民法院。如果执法主体的责任不能完全到位，对《工会法》的认知和执行便难以到位，最终必然影响到工会维权基本职责的切实履行。因此，要从根本上让工会主席摆脱“我维护职工权益，谁来维护我的权益”的困惑，关键在于有关各方切实担负起责任，对工会履行职责给予应有的支持。

当然，维护基层工会干部权益，工会自身也须努力。在这两起基层工会主席权益受侵害事件中，关键时刻上级工会挺身而出，迅速介入，为基层工会干部撑腰，并采取相应措施，努力调动社会资源促进工会干部权益保护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如深圳市总工会依法首次使用“公开谴责”维权，严正表明工会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对增加工会维权手段很有示范意义。

目前，这两起基层工会主席权益受侵害事件处理尚在“进行时”，不论最终结果如何，都无损工会干部权益保护话题的严肃性和迫切性，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工会干部自身利益、关系到工会维权基本职责的履行，更关系到劳动关系的协调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

中国新闻名专栏 | 有话直说

政府的钱真的“花不完”？

□瞿玉杰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全国财政累计支出56235.97亿元。而今年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报告中全国财政应完成支出76235亿元，这意味着全年财政支出的进度仅完成了73.8%。根据预算支出和已完成支出间的差额，12月一个月，全国财政部门要突击花掉2万亿元。（见12月13日《重庆晚报》）

全国全年财政支出进度仅完成7成多，被网友戏称为国家“钱多得花不完”。这至少暴露了两个问题：

一是编制中央财政预算的支出部分时，一些地方和部门“狮子大开口”，热衷于“跑部钱进”，将中央财政预算视为一个利益博弈场。多报、虚报预算开支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与目前财政预算编制的透明度不高有关，与预算编制部门及其人员在资金分配上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有关。

二是财政支出管理效率有待提高。11月初，媒体报道吉林省四平市五所中小学因为政府财政拨款没到位，迟迟未能开栓供热，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教师挨冻。原因在于财政没有按月将杂费拨付到学校。事实上，类似涉及社会保障、公益事业等财政支出“集中拨付”问题在不少地方都不同程度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财政的钱并非“多得花不完”，而是有些该花的钱没有及时花出去。

而要解决财政支出进度滞后的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杜绝多报、虚报预算现象；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支出的日常管理，及时预警、及时督办落实。

圈点新闻 □阿 黄

集体宣誓“不欠薪”

●新闻——

据《河南商报》报道，近日，郑州市二七广场上演了一幕“集体宣誓”——68位老板齐声承诺：永远不拖欠、克扣员工工资。

●圈点——

上述一幕成了新闻，让人五味杂陈。建议公布这些宣誓老板企业的名单，一则是为了让这些企业的职工吃定心丸；二则更是为了便于社会监督，以免有人“说一套做一套”。

“单一计费”终成真

●新闻——

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对移动电话拨打长途电话实行单一计费方式，降低资费水平，即自明年1月1日起，移动电话在本地拨打长途电话时，将取消本地通话费；在国内漫游状态下拨打国际及台港澳电话，取消现行叠加收取的漫游主叫通话费。

●圈点——

这个好消息让人等得太久了，甚至都高兴不起来了。据测算，上述措施每年可为手机用户减负逾60亿元。也就是说，措施实行之前，每年手机用户都要为电信企业的腰包贡献这么多钱了！唉！

“天价”脐橙孝父母

●新闻——

据《重庆晚报》报道，近日，重庆一房地产老板用18.8万元买下一颗重880克的“脐橙王”，声称要孝敬父母。

●圈点——

18.8万元，如果按每平方米1万元计算，可以买18.8平方米的房子了。在房价疯涨的当下，这则本是为了赞美孝心、炫耀财富的新闻，说不定又要在“房奴”本就脆弱不堪的神经上狠狠地刺一下了。

独家观点 □林 琳

“养鱼式执法”是拿权力和法律创收

据《法制日报》报道，日前，黑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哈尔滨市道路运输管理处派员前往通河县调查获悉：今年初以来，该县254辆私家黑车通过交纳5000元罚款获得了“合法”营运一年的权利，其中24辆车因家庭条件困难罚款3000元。该县将此解释成“扶贫解困”之举，且拉动内需。有关专家表示，这是“养鱼式执法”。

“养鱼式执法”不是什么新概念，它是指违法者有违法苗头或刚刚开始违法时，执法者不及时制止，而是让违法者实施违法，或者放大违法，然后再执法。比如，对一些卖盗版书、盗版光碟的商家，有关部门并不是致力于彻底打击取缔，而是一有严打便找上门去罚款，拿了钱就走人，下次严打再去；对一些在建的违章建筑，有关部门先是不管不问，等其渐成规模或者完工之后，便开始“执法”，于是，一些违章建筑在缴了罚款之后变成了“合法建筑”。

先“放水”，把鱼养大、养多，然后再时不时去“执法”一下，似乎成了一些部门的执法习惯和规则。原因何在？

国家明确规定，行政机关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任何地方和部门不能擅自下达收费、罚款的指标，不允许把法定的本应上缴的收费、罚没收入与本地本部门的经费划拨、职工奖金福利挂钩，坚决禁止上缴提成。然而，这一规定的落实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一些机关内部还是在用罚款多少来考核执法人员，个别地方在财政上仍对罚款有一定依赖性，个别执法机关也仍在从罚款中分成。于是，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执法机关选择养着违法者，既可以时不时去罚点款，又可以完成指标、干出成绩。

“养鱼式执法”是一种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贻害颇多。首先，行政机关以罚代管、以执法的名义创收谋利，等于把执法行为变成了一种经营行为，出卖了公权力，也出卖了法律。其次，它纵容甚至培养了一些人的违法行为。只要交了罚款，违法行为便获得了“合法性”或者说享有了“违法权”，从此，黑车可以堂而皇之地载客收钱，盗版碟可以在市场上广为流传，一些污染环境、有安全隐患的企业也可以继续生存。这样的执法者跟那些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人有什么区别？最后，这一罚一放之间，受到伤害的恐怕还有那些遵纪守法的公民的权益，比如合法运营的车主。

罚款是一种重要的执法手段，但绝不是行政管理的目的。类似现象时有发生，说明我们对公权力的监管、对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管存有漏洞，应引起警觉。

图说 □赵春青/画

靠山

据《新闻晚报》报道，近日出台的一项“中国幸福指数调查”显示，公务员已经成为当下公认的最幸福的职业。一些没考上公务员的女孩，纷纷以嫁个公务员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有人将考公务员的称作“考碗族”，将嫁公务员的称作“嫁碗族”。虽然金融危机下，就业困难，但婚姻毕竟是一辈子的事，当三思而行。

大众话题 □黄哲雯

烟草企业冠名希望小学之忧

去年地震后，四川灾区建立了一所“四川烟草希望小学”，不仅屋顶上有明显的“中国烟草”的标识，楼下的一块石板上还写着“立志奉献社会，烟草助你成才”——据12月13日《法制晚报》报道，我国以烟草企业冠名的希望小学共有17所。

烟企捐建希望小学本身，从目前情况看当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是，为什么允许用烟草企业来冠名希望小学？为何不考虑可能给幼小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于烟草企业的赞助语，不少人看了以后都有一种沉痛的感觉。烟草企业冠名希望小学，把广告做到了校门内，让人怀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在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让小学生与烟草零距离地接触，“润物细无声”地间接培养未来烟民。这样做，有违《禁烟法》的有关规定。

众所周知，烟草对未成年人的侵害非常大，作为成年人，应该充当起未成年人守护者的角色，尽最大可能地不让他们接近烟草。而烟草企业冠名希望小学的做法让人觉得，他们的公益行为和社会责任是打了折扣的，他们不是在无私地赞助，而是为了企业利益做隐形广告。

与个人和其它行业的企业捐建希望小学，可以用名字来冠名校名所不同的是，烟草行业属于特殊行业，生产出的产品已被医学证明对人体健康弊害多多，因而其广告和赞助行为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当面对心智尚弱的未成年人时，所受限制就要更加严苛。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国家的未来负责。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国，中国被要求从2011年1月开始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这要求我们从现在开始努力，让烟草广告少些再少些。

友好合作发展中亚

(上接第1版)

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在仪式上的致辞也表达了由衷的感谢：

——“真诚感谢建设者们忘我的献身精神，感谢高瞻远瞩的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领导人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国人民……”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说。

——“感谢建设者、工程师付出的巨大努力，使我们共同完成了先辈的遗志，复兴伟大的丝绸之路，”纳扎尔巴耶夫说。

——“感谢中国的工人、建设者、工程师，是他们忘我投入的工作，以最短的时间完成了21世纪的一项伟大工程，”卡里莫夫说。

建设者的功绩，无愧于这般称誉。茫茫沙磧之上，荒无人烟的地方，中亚地区处理高含硫天然气功能最齐全、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天然气处理厂拔地而起，实现跨国联合调度，造福四国人民。

登高而望，蓝天丽日之下，银亮的大型生产装置和管道熠熠生辉。壮观的景象令人赞叹不已。

造福人民的事业，必然受到人民支持。从土库曼纳巴特到阿姆河右岸天然气处理厂，数万当地民众和天然气处理厂员工兴高采烈地夹道欢迎贵宾到来。他们挥舞着四国国旗，用四国语言兴奋地高呼“热烈欢迎”。优美的乐曲声中▮▮奋蹄，矫姝善舞，表达了主人真诚的盛情。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是中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精诚团结、互利合作的典范。”胡锦涛的高度评价指明了这项工程的意义所在。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纳扎尔巴耶夫、卡里莫夫也对这项工程所体现的友好合作精神倍加赞赏。他们表示，相信这条新时代的丝绸之路将为加强中国同中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发挥重要作用。

盛典的余音在旷宇中萦绕，牵动着人们对这项工程造福本地区人民的深深感念。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作为此项工程的主力，积极参与管道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既积极开展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又主动担当社会责任。中国石油各项目有当地员工约2万人，本地化程度超过90%，中层经理中当地员工占60%以上。中国石油开展的公益行动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土库曼斯坦，向文化、教育、医疗、留学生资助和残疾人救助等方面累计投入突破700万美元，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外资企业；今年还启动了旨在为今后5年培养100名留学生的人才工程。在哈萨克斯坦，积极支持扶贫帮困，帮助发展农业、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设施。在乌兹别克斯坦，出资维修老路老桥，照顾当地残疾人……

中国建设者同当地人民结下深厚友谊。中国石油从事设计工作的程林告诉记者，他在这里同当地人民并肩奋斗了一年多，彼此结下深厚友谊。他深情地说：“我们可以骄傲地告诉祖国人民，我们不辱使命，完成了建设任务，为本地区人民友好合作开拓了新天地。”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建成通气生动地说明，让友好合作精神贯穿中亚大地，必将推动本地区各国共同发展。正如胡锦涛所指出，我们应该将这一项目多方参与、共同受益的合作模式和彼此互信、平等相待的合作经验，全面推广到各个合作领域，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深入发展，并为本地区区域合作机制化、规模化打下坚实基础。

胡锦涛的讲话道出了四国人民的共同心声：“让我们以这条管道为见证，共同祝愿我们四国友谊之树枝繁叶茂，祝愿我们四国务实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新华社阿什哈巴德12月14日电）

研究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政策措施 全面启动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

(上接第1版)适当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和公共租赁房用地供应，提高土地供应和使用效率。在保证质量前提下，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二要继续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型住房消费，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加大差别化信贷政策执行力度，切实防范各类住房按揭贷款风险。三要加强市场监管。继续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加强房地产市场监测，完善土地招拍挂和商品房预售等制度。加强房地产信贷风险管理。四要继续大规模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争到2012年末，基本解决1540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

会议指出，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各地加大了对建筑质量差、设施简陋、居住密度高的棚户区的改造力度，大批居民住进新居，群众生活质量和城市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目前我国一些城市和国有工矿及林区、垦区仍有近1000万户家庭居住在棚户区。会议决定，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城市和国有工矿集中成片棚户区改造，有条件的地方争取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中央财政对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给予适当支持，省和市、县人民政府应切实加大资金投入。鼓励采取共建的方式改造国有工矿棚户区，引导社会资金积极参与。鼓励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提供贷款。免征相关改造项目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优先安排土地供应。继续按现有政策推进国有林区、垦区和中央下放地方煤矿的棚户区改造。

会议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结合当地具体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行政学院工作条例(草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上接第1版)标准只有一个：老百姓有饭吃、有钱花。

回到家里，他继续琢磨：“当前，最先要抓的是蔬菜。”

菜这东西，卖得了是钱，卖不了不如一堆草。王伯祥知道，白菜悲剧的根源，在于没有市场。

那可是改革开放开始不久的1986年。“市场”？那么陌生，那么敏感，甚至有点让人胆战心惊。

千槌打锣，一锤定音。众人的目光，齐刷刷投到王伯祥身上。

王伯祥猛地站起身，一捻烟屁股：“乌纱算什么？百姓最重要！真有什么政治责任，我一人承担！”

年底，一纸《关于培育和完善九巷蔬菜批发市场的意见》发往全县。

市场经济的幼苗，在寿光这片土地上抽出第一尖嫩芽。

建它个中国最大的“菜园子”

1986年7月的一天，九巷蔬菜市场人山人海，车辆满满当当，想进进不去，想出出不来，怨声一片：20亩地的小小市场，怎么盛得了一万人啊。

望着脸上写满无奈的卖主买主们，一股豪气在王伯祥胸中升腾：九巷啊，我们要把你建成中国北方最大的蔬菜市场，用你撬动寿光。

在王伯祥带领下，全县近万名干部职工齐上阵，硬化地面，铺设管道，搭建交易大棚，招收记账员、服务员、经纪人……扩建后的九巷蔬菜市场占地150亩，终日车水马龙。1987年，实现蔬菜销售2.5亿公斤，交易额1.5亿元。1991年，这个市场再扩至600亩。

市场发达了，与外界的沟通又成了问题。那时候，一个村顶多有一部“摇把子”电话，往外县、外市、外省打长途，一个电话要等半天、一天、甚至几天。马店乡几个青年在北京、上海见过一种不用摇的电话，按数字转上几圈就能拨通。

寿光不能等啊！

王伯祥一次次跑省城，一次次提申请，指标最终拿到，第一部程控电话就安在九巷……

习惯超前思维的王伯祥，很快开始了新的思考：怎样让寿光既没有卖不出去的菜，也没有买不到的菜，让全国帮寿光发展蔬菜生产呢？

国营商业、蔬菜销售协调委员会、运销联合体、县境外的客户……王伯祥叫上办公室副主任、“小秀才”武恒祥，一起到孙集镇验证自己的思路。路上，“小秀才”补充一条：搞蔬菜保鲜加工。

“那，咱就在这五条渠道上做文章。”

“就叫‘五渠通天下’！”两人相视大笑。

两天后，“五渠通天下，四海集一市”的对联挂上了九巷市场入口处的牌坊。

王伯祥率先垂范，带领商业、供销人员多次进京，与北京市8个区的蔬菜公司和5个蔬菜批发市场建立了稳定的业务联系。北京和寿光之间开辟绿色通道，确保寿光菜无障碍进京。

一个四通八达的蔬菜购销网络初步形成。东北的土豆，甘肃的洋葱，江浙的莲藕，江南的黄瓜、辣椒，苍山的蒜薹，安丘的生姜……寿光人可以把菜卖到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的人也以到寿光来卖菜。

1990年初，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寿光考察后，对王伯祥说：“希望你们把这项技术向全国推广，解决全国冬季吃菜的难题。”

有人担心，一旦把技术传出去，寿光的大棚菜就会成为没人要的白菜帮子、玉米叶子。寿光人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腰包，很快就会瘪下去。

王伯祥心中猛醒：思想狭隘，意识守旧，才真的可怕，是寿光最大的敌人。

为统一认识，县委县政府专门下发文件：凡来取经的，全面参观，认真传授；应邀讲课的，讲深讲透，有问必答；技术员要多少派多少，并且派最好的去。

“保护市场，就是保护寿光人的命根子。”

当县委书记五年半的时间里，王伯祥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是看蔬菜市场送来的报表，数量、品种、价格、交易量一应俱全。在王伯祥眼里，这是菜农喜忧的“晴雨表”，群众诙谐地说，这是王伯祥的“天天读”。

“+”多，表明蔬菜上市量多，交易额大，价格好，群众满意，他高兴；“-”多，表明上市量少，交易额小，价格差，群众撅嘴，他寝食不安。

有一天，“+”“-”的变化有点反常，成交量和价格出人意料地下滑。王伯祥眉头紧锁，叫来市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孙玉祥询问情况。

原来，随着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变大变强，暗流开始出现：不轨人员暗中联手、欺行霸市，小偷小盗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一些中介缺斤短两、掺杂使假，有的甚至大打出手、殴伤菜农客商……

王伯祥怒不可遏：“非下猛药杀杀这些菜虫子不可！”

经过半个月的治理整顿，市场秩序迅速好转，蔬菜交易一如既往。

举一反三，王伯祥经常告诫干部：“我们自己的种种疾患，同‘菜虫子’一样，都是市场的大敌。哪怕服务态度的好坏，也是同人民群众有无感情、感情深浅的试金石。我们一定要心和菜农一起跳，血和菜农一起流。”

渐渐地，大市场感受到了小市场的影响，一些乡村开始试图取缔小市场，以此为营生的“二道贩子”们一下子急了眼。几个“二道贩子”直接找上“伯祥书记”。

王伯祥二话没说，拉上来人钻进小汽车：“走，先看看去！”

上午实地调查，下午县委开会研究。第二天一早，县委决定公布：小市场不但要保留，还要继续发展，要像爱护、支持大市场一样，爱护、支持小市场。

冬暖式蔬菜大棚：一根黄瓜带来的改变

夏天是草，冬天是宝。虽已种菜千年，但一到冬天，寿光人吃菜仍只能靠贮藏。

1988年腊月廿八下午，准备下乡的王伯祥刚要动身，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闯了进来。

“我给您带来一样东西。”王乐义从背后拿出一根顶花带刺的鲜黄瓜。

“哪来的这玩意儿？”王伯祥一惊。

“东北的！”王乐义一个做蔬菜生意的堂弟打听到，大连瓦房店市瓦房村一位叫韩永山的师傅，冬天不生炉子就能种出黄瓜来。

种黄瓜不用生炉子！王伯祥眼里一下子放出了亮光：“这不是黄瓜，是黄金呀！东北能种，咱们也能种！”

“把韩永山请到寿光怎样？”王伯祥和王乐义商量。

“我试试吧。人家不来，咱也不能绳捆索绑啊！”

“不是试，是必须！让他尽管开条件，一切由县里兜着。他一来，价值就大了去了。”

“那，他就是一座山，我也搬来！”

1989年5月，王乐义果然把韩永山请到了三元朱村。王伯祥立马赶来：“从今往后，三元朱就是你的家，寿光就是你的家！”

韩永山，这个从来没被如此看重过的东北汉子，当场红了眼圈。

听说搞不生炉子的过冬大棚，大伙儿说啥也不相信。任凭韩永山再怎么保证，就是没人接茬。一个大棚六七千元，在当时的农民眼里，可是天文数字呐。

“不就是几万块钱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王伯祥向王乐义面授机宜，“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和干部。”

两天以后，王乐义的电话来了：17名党员报名，一人一个大棚。

1989年8月10日，17座新式大棚出现在齐鲁大地上。眨眼间，大棚里钻出了绿芽芽……

水嫩嫩的鲜黄瓜运来时，寿光县城沸腾起来。5元，8元，10元，12元……价格一路飙升。

伴随三元朱村的成功，全县推广冬暖式大棚提上日程。

1991年，冬暖式大棚、弓棚菜、露地菜，覆盖了寿光南部半壁江山。曾经温饱不保的20万户寿光农民，户均收入达两万多元，全县城乡储蓄余额超过60亿元。

……

寿光人说，没有他，没有当初他打下的好基础，寿光不会有今天。

他却说，为官一任，只为“人民至上”，别无他求。

（据新华社济南12月14日电）